

社区嵌入视角下城市老年人社会融入的困境及结构性成因分析

张 洋

贵州大学管理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0日

摘 要

在深度老龄化的背景下, 城市老年人面临“空间在场、关系离场”的社会融入困境。本文以社区嵌入为视角, 对城市老年人社会融入的现实困境与结构性成因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 老年人面临社会交往网络萎缩、公共参与不足、支持供给乏力及身份边缘化等社会融入困境, 其根源在于结构脱嵌、网络断裂、文化排斥与制度惯性四重成因的连锁作用。基于此, 本文从社区公共空间亲和性、邻里互惠规范修复、老年自发组织的自主空间及社会认同与承认等四个方面, 探讨老年人从“脱嵌”走向“再嵌入”的社会条件。可为基层老龄治理优化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老龄化, 社会融入, 社区嵌入, 结构性成因

An Analysis of the Dilemmas and Structural Causes of Social Inclusion among Urban Older Ad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Embeddedness

Yang Zh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y 2, 2026; accepted: August 12, 2026; published: August 20,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eep population aging, urban older adults face a social inclusion dilemma

文章引用: 张洋. 社区嵌入视角下城市老年人社会融入的困境及结构性成因分析[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8): 289-296.
DOI: 10.12677/ar.2026.138557

of “spatial presence yet relational abs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embeddednes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practical dilemmas and structural causes of social inclusion among urban older adults. The study identifies four inclusion barriers—shrinking social networks, insufficient public participation, inadequate support provision, and identity marginalization—rooted in the interplay of structural disembedding, network fragmentation, cultural exclusion, and institutional inertia. 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social conditions for transitioning from disembedding to re-embedding across four dimensions: spatial affinity of community public spaces, restoration of neighborhood reciprocity norms, autonomous space for older adults’ self-organization, and social recognition. This study offer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optimizing grassroots aging governance.

Keywords

Aging, Social Inclusion, Community Embeddedness, Structural Caus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中国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截至 2025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约 3.2 亿人,占总人口的 23.0% [1]。人口老龄化所牵动的远不止人口年龄结构的本身,更是对城市社会关系、社区形态与日常生活秩序的一次重塑。在城镇化不断推进、城市居住格局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家庭结构变得更小型化与核心化。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有 60 岁以上老年人居住的城镇家庭共 9179 万户,其中,独立居住老人 4852 万户,占比已上升至 52.9% [2]。传统乡土熟人社会逐步消解,单位制退场后社区功能的重新定位也仍在摸索之中。城市社区从以往邻里守望、交往密切的生活共同体,转向一种流动性更强、人际更疏离的陌生人聚居空间。在这背景下,大量城市老年人在退休后,生活场所逐步减小到社区内部,社区已成为他们日常活动、社会交往与情感归属的载体。

老龄研究与社会政策的关注点多在物质保障和养老服务供给等方面,现有研究也多从公共服务供给和养老政策完善等方向展开。这些探索无疑具有基础性价值,但一个社会学问题还未得到解决,当个体退出劳动领域、弱化其在核心家庭中的工具性角色后,能否在近身的社会空间中与他人重新建立有意义的联结,关乎着晚年生活的质量。这一问题的要害是老年人与社会之间的社会联结为何松动、如何断裂,而不是单纯缺少某种资源。事实上,大多城市老年人虽居住在社区,在社会交往、公共参与和身份归属上却处于疏离状态,空间上的在场与社会关系上的离场,成为了老年人社会融入困境的核心表征。

本文从社区嵌入这一视角,分析城市老年人社会融入的现实困境,从社会结构、社区场域、家庭代际等方面分析结构性成因,研究其实现的社会条件,为基层社区促进老年人社会融入提供参考。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老年人社会融入研究

社会融入概念在社会学领域的应用经历了从个体适应逐步走向结构分析的范式转换。早期研究主要聚焦在移民与少数群体的文化适应问题,此后随着社会排斥理论的兴起,学术关注的重心逐渐从个体层面的“适应能力”转向社会结构层面的“排斥机制”,社会融入由此被重新界定为消解制度性与社会性排斥、保障弱势群体得以参与社会生活的动态过程[3]。在老年社会学领域,分离理论将老年期社会参与

的衰减看作个体衰老过程中的自然常态，活动理论虽然持相反观点，但二者都局限于从个人的身心状态与角色适应等个体层面理解老年融入问题，未能进一步触及导致老年人社会边缘化的结构性根源[4]。

风笑天通过对全国五大城市的调查数据，较早注意到家庭规模小型化与代际居住分离对老年人社会交往空间所产生的挤压效应[5]。王萍等运用社会网络视角，对老年人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作用于生活满意度的机制进行了系统考察，发现网络规模与紧密度对老年人情感支持的获取具有直接影响[6]。王宫傲系统分析了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结构特征和变化趋势，指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存在明显的组织依赖，自组织参与渠道的匮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老年人融入社区生活的自主性[7]。李宗华等对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的主要模式与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参与渠道不畅与支持网络弱化构成了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主要障碍[8]。这些研究虽推动了结构分析转向，但在解释困境时仍倾向于将多重因素并列，未能以单一视角进行分析。

2.2. 嵌入性理论

嵌入性理论的核心在于一切具有目的性的社会行动，均不是由原子化的个体凭空作出，也不是对社会规范的机械执行，而是始终“嵌入”在具体的、持续运行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9]。该理论在学理上同时拒绝了经济学的“低度社会化”假设与传统社会学的“过度社会化”假设，将行动者重新置于具体的社会关系结构中进行考察。嵌入性理论隐含了一个动态的风险命题，脱嵌：当个体所依存的社会关系网络瓦解、制度环境松动或文化认同消退时，便可能从原有的社会联结中脱落，陷入社会性孤立状态。

社区嵌入所指的并非养老服务在物理空间中的简单配置，而是老年人的社会存在真正扎根于社区社会关系土壤的深度与广度[10]。这一概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在微观层面，关系嵌入是社区嵌入的基础，它关注老年人在社区中能否形成具有一定密度的邻里交往与同辈互动，这些偶发或持续的弱关系恰好充当着社会信任的基层载体。在中层维度，制度嵌入考察的是社区组织形态、活动机制与公共参与渠道是否将老年人吸纳为具有合法身份的参与者与贡献者。在深层意义上，文化嵌入则关注社区中通行的年龄话语与价值观念是否能够赋予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和晚年生活以积极的身份意义。三个层面环环相扣，任何一环出现弱化或断裂，都有可能将老年人从社区共同体的社会联结中推向“脱嵌”[11]。

3. 城市老年人社会融入的现实困境

从社区嵌入视角进行分析，城市老年人社会融入的困难并不是模糊的“孤独”或笼统的“不参与”，而是一种多方面的嵌入弱化。在关系、制度、文化等维度上，老年人与社区之间的联结正在松动。

3.1. 社会交往网络萎缩，关系嵌入趋于稀薄

退休引发的变化，并不只在于退出劳动岗位本身，更重要的是职业关系网络的整体脱落，而这也正是大多数成年人在家庭之外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来源。交往空间由此受到限制，老年人的日常社交活动逐渐集中在家庭和社区这两个较小的空间里。但现代城市社区的邻里关系已表现出高度稀薄化的状态，居民之间进行的接触大多停留在功能性交往层面，例如电梯间的一次点头、快递柜前的一次短暂照面，这些互动通常既没有情感厚度，也难以变成稳定的关系联结。一些老人通常几天都没有和邻居进行过真正的交流。同时，老年人因身体条件的限制、慢性疾病的困扰、社会网络的萎缩以及制度性年龄歧视等多方面的原因，很难顺利参加社区活动。这种关系嵌入的稀薄化，根源并不在于老年人是否善于和人交往，而在于可供他们嵌入的社会关系接口，已经被压缩到了一个相当低的水平。

3.2. 社区公共参与不足，制度嵌入趋于悬置

社区公共事务与文化活动本是老年人建立公共角色、确认社区成员身份的重要渠道。但在现实中，

社区活动的形式长期围绕棋牌室、广场舞和节庆联欢等固定模式展开，对那些不感兴趣或兴趣更为多元的老年群体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的分析显示，退休老年人社会参与类型不均衡，社会交往活动参与率最高，占比 91.36%，志愿服务活动与政治参与活动分别占比 39.86%、38.63%，而社会经济活动占比最低，仅为 7.18% [12]。同时，部分社区在招募志愿者或议事代表时，隐性的年龄门槛依然存在，一些身体状况良好且参与意愿强烈的老年人，往往被挡在公共参与的制度安排之外。社区活动中还呈现出“大妈主导、大爷缺席”的性别化参与失衡现象，社区里女多男少的状况虽有所缓解，但老年男性的社区参与积极性仍然远远不够。当参与通道趋于狭窄且类型单一时，老年人很难将自身真正嵌入社区公共生活，最终成为社区中“沉默的居住者”。

3.3. 社会支持供给不足，嵌入功能趋于失效

个体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一项主要功能是在需要的时候从中获得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工具性支持。不过对城市老年人而言，家庭支持因为代际空间分离逐渐表现出远程化和间断化的特点。子女虽然通过电话和视频同父母保持联络，但这些片段式的联系终究不能替代日常化的在场陪伴。同时，社区提供的正式支持有日间照料中心、助餐点和社区卫生站等，这些设施分别由不同系统管理，各设施之间存在壁垒，很难对老年人的需求形成连贯且共同回应。家庭非正式支持和社区正式支持的共同减弱，导致了嵌入关系在功能上已经逐渐失去作用。

3.4. 自我身份边缘化，文化嵌入逐步瓦解

社会融入既关乎一个人“做什么”，也关乎他“认为自己是谁”。在城市社会快速变化与年轻中心主义文化的双重挤压下，不少老年人逐渐将社会对老年群体的贬损性认知吸收为自我评价，退休后“没用了”，在子女家“成了拖累”，在社区里“只是被照顾的人”。这种身份的自我边缘化，成为了文化嵌入瓦解最为深层的一种表征，老人不再将自己视为社区文化共同体中平等且有意义的一员。相比于客观层面的社会排斥，这种自我边缘化更难应对，因为它关闭的并不是社会参与的大门，而是参与的内在动机。

4. 城市老年人社会融入困境的结构性成因

城市老年人社会融入困境的产生，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结构力量在特定进程中叠加作用的结果。本节从结构、网络、文化与制度四个维度，分析困境产生的结构性成因。

4.1. 结构脱嵌：当社区不再是“容器”

嵌入得以发生的基本前提，是存在一个稳定的结构，可让个体将自身的关系网络安放其中。对中国城市老年人来说，这一结构在短短数十年间经历了一场从有到无的根本性变迁。

第一，单位制的解体。在传统的单位制组织模式下，退休并不代表从社会关系中剥离。单位大院的生活半径、同事间的日常往来以及工会组织的退休职工活动，让老年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在退休之后仍保留有一个制度化的锚点。然而，随着住房商品化和单位后勤社会化改革，退休人员被整体性地纳入社会化管理，单位作为关系容器从老年人的生活中迅速离场。但社区并未同步完成从“地理居住单元”向“社会关系容器”的功能跃迁。老年人被从单位制度中剥离出来，却没有被社区制度重新收纳，这种脱节成为了结构脱嵌发生的深层逻辑。

第二，城市社区的深度陌生化。商品房小区取代单位大院成为城市的主流居住场所，居民之间的互动模式随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人们依然住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之内，却不再编织共同的社会关系网络。老一辈所熟悉的“大院式”邻里记忆，在新的居住形态中难以找到生长的土壤。当社区在结构意义上仅仅被化约为一处房产边界，而非一个关系容器时，老年人便丧失了将自身嵌入其中的最基础性的接口。

社区不再是一个能够让老年人与他人在互动中建立联系的关系空间，而仅仅退化为一处居住的物理坐标。老人身居一墙之隔的小区之内，却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将其关系网络重新组织起来。

4.2. 网络断裂：关系纽带渐趋松弛

老年人的社会网络主要由代际纽带、同辈纽带以及社区中的弱关系交织而成。

第一，代际纽带由于空间居住分离而出现功能性断裂。家庭核心化和子女异地就业让代际分居成为普遍现象。调查表明，超过 65% 的城镇老年人更愿意与子女“同城不同住”，这一比例较十年前大幅上升；城市老年人实际独立居住的比例达到 65.4%，仅 26.8% 与子女同住。这些数据印证了代际空间分离已从个体现象演变为结构性特征[13]。子女虽可以使用手机与父母保持远程联系，但这种联系本质上是片段化和间歇性的，不能产生日常在场互动所具有的情感厚度与频率。费孝通描述的中国传统家庭“反馈模式”，正在发生空间性重构，代际之间的联系在居住分离的情况下表现为定期探访和远程通话，反馈的频率与深度大幅下降[14]。

第二，同辈纽带在流动中不断消散。一部分健康老人随季节迁往南方，另一部分老人因照料孙辈或投靠子女而成为“老漂族”，原来社区中的同辈朋友圈被反复打散。老年人的同辈关系本来有望成为家庭关系弱化后的重要替代性资源，但因其高流动性与不稳定性让这变得难以实现。

第三，社区中的弱关系同样在不断弱化。格兰诺维特[15]提出了弱关系在信息传递与机会获取中所起的独特桥梁作用，而在社区的日常生活中，与邻里的偶然交谈、在菜市场或绿地的日常照面，恰恰构成了关系嵌入最普遍也最基础的形态。然而，陌生人社区恰恰缺少适宜弱关系自然生发的接触场合，老年人与邻居、与社区中其他代际群体的偶遇变得越来越少。

当三类纽带不断弱化，老年人的社会网络便不断向核心家庭收缩，最终沦为一座联系稀疏、缺乏外延的社会孤岛。

4.3. 文化排斥：在话语中被推向社会边缘

年龄分层是社会按照年龄分配角色、资源和机会的一套隐性秩序。在现代社会中，这套秩序将老年期整体性地定位为“衰退期”，逐渐退出生产领域，淡出公共空间，进入被照料的状态[16]。这通过两个方面发挥排斥作用。一是在公共话语中反复言说“银发浪潮”“养老负担”等人口焦虑话题，二是在日常生活和大众媒体中持续传播“多病体弱”等老年刻板形象。

戈夫曼的污名机制在此清晰地运作起来[17]。一旦老年群体被贴上“被照顾者”“负担”“过时的人”这类标签，社会便倾向于以区别化的方式对待他们。更具破坏性的影响发生在标签接受者一方，那些日复一日浸染于这些话语中的老年人，很容易将外部的否定逐渐内化为自我认知，产生“我确实不中用了”“人老了就该安分一点”等想法。有研究关注到年龄歧视对老年人参与行为的抑制效应[18]，这种歧视的作用不在于设置具体的行为障碍，而是它悄然改变了一部分老年人的自我认知框架。文化排斥正是在这种温和而持久的日常话语中，将老年人从社区共同体缓慢地推向边缘。

4.4. 制度惯性：单向照料丧失参与性

制度惯性指的是社区治理层面对老年群体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定势与操作惯例，它将“老年工作”等同于“养老服务”，进而将“服务”简化为“照顾”与“供给”。这种惯性表面上充满善意，却在制度设计的基底层面上将老年人悄然排斥在社区公共生活的创造性进程之外。

当前社区涉老工作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那些可量化可考核的硬指标上，建成了多少间日间照料中心，为多少老人提供了助餐服务，完成了多少人次的上门探访。这类服务供给当然有其现实价值，但

当社区将此作为与老人打交道的主导模式时，便不自觉地替老年人定义了一种单一角色，即被动的接受者。老人的社会关系是否需要重建，社区归属感是否需要培育，公共参与渠道是否需要拓展，这些难以量化的软需求因为无法进入现有的考核框架，便从治理视野中逐渐消失了。

制度嵌入被窄化为单方面的服务嵌入，而非双向的参与嵌入。真正的关系嵌入需要承认行动者的能动性，而老人仅在作为“服务对象”或“被关怀的客体”时才能与社区发生制度性接触。长此以往，老人在日常体验中接收到的唯一制度信号便是接受，其主体性在善意的照料中被悄悄地消解，老年人作为能动主体嵌入社区公共生活的可能性反而越小。

5. 城市老年人社会再嵌入的社会条件

5.1. 社区公共空间的亲和性

如果社区空间缺少适宜老年人驻足、相遇和交谈的场所，没有尺度宜人的休息桌椅，没有树荫遮蔽下让人愿意多停留片刻的活动角落，也找不到能让老人“顺路坐一坐”而不必带有明确目的的半公共区域，那么邻里之间偶然的、反复出现的互动便无从发生。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照面，恰是关系嵌入得以开启的第一块砖，缺少了这样的空间条件，这块砖便迟迟无法砌下。

从社区嵌入性理论的视角来看，公共空间的亲和性直接决定了弱关系能否在社区土壤中自然萌生。这种亲和性具体体现在空间的尺度是否亲切宜人，位置是否落在老年人日常动线的必经之处以及环境是否让人感到自在而不必承担某种义务。只有当这些条件大致具备时，老年人才可能在日复一日的进出之间，与邻里产生不经意的交谈，从偶尔的点头之交逐步走向有实质内容的人际联结。

进一步来看，公共空间的亲和性还关乎老年人是否感到自己“属于”这个地方。一个真正具有亲和性的空间，应当让老人感到被接纳，可以在不被打扰的环境中从容待着。当这些细微的空间品质汇聚在一起，公共空间便不再只是一块物理意义上的空地，而开始成为社会意义上的关系容器，老年人的日常互动才有了可以扎根的地方。

5.2. 邻里互惠规范的修复

互惠把嵌入关系从一次性接触提高为持续性社会联结的主要方式。邻里间形成一种默契的非正式互助模式，例如帮忙收取快递、代为留意家中异常情况、互通生活所需，老年人在这些日常微弱的循环中获得了被需要的角色价值。该过程的重点在于老年人不是被动等待帮助，而是作为互助网络里主动的节点参与到其中。该互惠的本质属于社会交换，并不是被服务，其通过平等的参与者身份来界定老人，没有把老人固定在弱势接受者的位置上。老年人因受到需要，形成了建立社区身份认同的主要心理资源。

邻里互惠规范在社区里重新建立，给老年人社会再嵌入提供社会资本基础。帕特南对互惠规范的经典论述表明，普遍化互惠是指我给予你帮助，不期待你立刻回报，因为相信在未来的某时，这种帮助会通过某种方式返回给我或者该共同体里的其他人。这种规范减少了建立人际信任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使社会关系能够脱离一次性的接触带来的脆弱性，并且形成一种稳定并且可以预期的联结状态。

5.3. 老年自组织的自主空间

自发成立的老年社团，包括广场舞队伍、棋牌团队和银龄互助志愿者，是老年人从个体状态转变为集体行动者的主要途径。老年人在社会脱嵌之后进行的一种主动再嵌入尝试，是这些自组织形态的主要特点。他们通过自行组织的方式，为自己编织社会网络，创建公共角色，并在集体行动中重新获得价值意义。在社区给予尊重而没有进行过度干预的情况下，这些组织的自主性会成为老人自行制造嵌入关系的主要方式。社区应当承担的责任并非替代老年人去组建组织，而是要给那些自发组织提供具有合法性

的空间和必需的资源支持,使这些组织可以在不受到过多约束的环境中自然地发展。

5.4. 社会认同与承认

文化嵌入的重建需要公开且带有仪式感的社会认同和承认,社会应当重视老年人在漫长岁月中积累的生活经验、过往贡献,并认可他们在社区中的日常在场拥有独特的价值。在社区节庆活动里对老年志愿者进行表彰,或者在日常互动中通过态度和言语向老人的付出表达肯定,这些做法可以在文化方面传递一种正向的身份接纳,让老年群体在社区集体中获得切实的归依感。该种认可的意义在于其在根本上改变了老年人和社区之间相互关系的模式,不再只局限于帮扶与被帮扶的关系,而是变成共同建设生活共同体的平等关系。社会若能改变固有认知,把老年人的社区参与看作价值贡献而不是单纯休闲消遣,从“为老人服务”的治理逻辑,慢慢转为“与老人共建”的社会逻辑,就可以给老年群体的身份认同提供有力正向反馈,也为文化再嵌入的实现打下最根本动力基础。

6. 结论与展望

城市老年人的社会融入困境,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体“主动性不足”,而是多重结构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结构脱嵌、网络断裂、文化排斥与制度惯性这四重结构性成因相互强化,共同将城市老年人锁定在“空间在场、社会关系离场”的困境之中。老龄化危机的表层体现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其深层内核则是社会代际关系、角色价值体系、公共空间布局与制度治理模式未能适配老年群体的现实需求,由此引发老年群体的社会脱嵌与身份边缘化。随着我国退休机制与养老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发展,老龄化问题的焦点也应逐渐从“养老资源是否充足”的供给问题,转向“社会关系是否可能在晚年继续生长”的社会嵌入问题,分析重心也相应地需要从老年人的个体条件移向社区的联结能力与包容程度。

本文基于文献与理论框架展开的结构分析,在微观经验的材料支撑方面仍有所欠缺,未来研究可借助深入的访谈与社区调查,进一步分析各种成因的内部机制及其相互作用。老龄化问题的实质不只是资源的丰歉,还是社会联结的存续。城市老年人能否从“被动养老”走向“积极嵌入”,最终取决于社区能否再度成为一张让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身位置、关系与意义的社会网络。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2026-05-01.
- [2]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 [EB/OL]. <http://www.stats.gov.cn/sj/pcsj/rkpc/7rp/indexch.htm>, 2026-05-01.
- [3] 彭华民. 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一个欧盟社会政策的分析路径[J]. 南开学报, 2005(1): 23-30, 103.
- [4] 李晶. 老龄社会背景下的老龄社会学研究[J]. 老龄科学研究, 2019, 7(4): 3-10.
- [5] 风笑天. 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结构: 全国五大城市的调查分析[J]. 社会科学研究, 2009(2): 104-110.
- [6] 王萍, 李树茁, 张文娟. 代际支持对中国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研究[J]. 心理科学, 2005(6): 222-225.
- [7] 王宫傲. 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影响因素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22.
- [8] 李宗华, 高功敬, 李伟峰. 基于 Logistic 模型的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影响因素分析——以济南市老年人社区参与为例[J]. 学习与实践, 2010(11): 101-110.
- [9] 符平. “嵌入性”: 两种取向及其分歧[J]. 社会学研究, 2009, 24(5): 141-164, 245.
- [10] 李翔. 社会嵌入理论视角下城市社区居家养老问题研究[J]. 广西社会科学, 2014(4): 131-134.
- [11] 杨玉波, 李备友, 李守伟. 嵌入性理论研究综述: 基于普遍联系的视角[J]. 山东社会科学, 2014(3): 172-176.
- [12] 李静, 王小凤. “积极”何以可能? 健康、保障与退休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困境[J]. 人口与社会, 2025, 41(6): 1-12.
- [13] 王跃生. 当代中国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及其变动: 基于 3 个视角的分析[J]. 人口研究, 2024, 48(4): 33-50.

- [14] 卢文秀, 吴方卫. 代际居住距离增加降低了农村家庭子女的养老支持吗[J]. 中国农村经济, 2025(1): 134-154.
- [15] 格兰诺维特. 镶嵌: 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 罗家德,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 [16]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学[M]. 第7版. 李康,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305-310.
- [17] 戈夫曼. 污名: 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修订译本) [M]. 宋立宏,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 [18] 杨菊华, 闫紫菊. 老有所为: 中国老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51(2): 36-48.